



CHINA-UNITED 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
中美交流基金會

CCIEE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中美經貿關係： 現狀與前景

會議總結報告

2019年7月9-10日

愉景灣酒店

愉景灣

香港



中美交流基金會

香港上環干諾道西 3 號億利商業大廈 20 樓

熱線：(852) 2523 2083

傳真：(852) 2523 6116

Email: info@cusef.org.hk

網址： www.cusef.org.hk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中國北京西城區永定門內大街 5 號

熱線：(8610) 8336 2165

傳真：(8610) 8336 2165

Email: ef@cciee.org.cn

網址： english.cciee.org.cn

中美經貿關係 現狀與前景

會議總結報告

2019年7月

目錄

報告概要	2
會議背景	5
開幕式	
• 歡迎辭	6
• 主題演講	7
議題一：中美經貿關係	
分組議題一：經貿關係現狀	
• 主題演講	10
• 小組討論	13
分組議題二：投資環境與技術創新	
• 主題演講	16
• 小組討論	19
分組議題三：宏觀政策	
• 主題演講	23
• 小組討論	25
分組議題四：得克薩斯州和美國中部地區代表談「合作」	
• 主題演講	29
• 小組討論	31
議題二：美中關係：現在與未來	
• 主題演講	35
• 小組討論	39
議題三：全球化、多邊主義和全球治理的前景	
• 主題演講	44
• 小組討論	48
附件：	
附件 1. 會議日程	51
附件 2. 大會電子相冊	

請登入 www.chinausfocus.com/2019forum 下載附件



報告概要

為重啟搭橋

在 G20 峰會后，為了助推重啟中美關係，中美交流基金會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於 2019 年 7 月 9 – 10 日在香港聯合舉辦了「中美經貿關係：現狀與前景」論壇。來自美國、中國和其他亞太地區國家的 40 多位重要的今昔利益相關者和影響者匯聚一堂，直面中美關係所面臨的挑戰，探求找尋共識的創造性新方法。

中美交流基金會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深信，建設性對話和多樣化交流對促進世界最發達國家與人口最多、發展最快國家之間的關係至關重要。「我們的討論不僅提供幫助，提供靈感，而且要激勵大家採取更多行動，來支持極為重要的中美關係」，中美交流基金會創會主席董建華在開幕辭中說，「希望這次會議結束的時候，我們能對未來更有信心。」

現狀與前景

本着彙集中美關係有影響力聲音的傳統，中美關係基金會邀請到眾多嘉賓來到香港參加論壇的專題討論，和作主旨發言。各位尊敬的發言者代表着中美關係中不同的利益攸關方，他們包括：

- **來自國際社會的：**加拿大前總理讓·克雷蒂安 (Jean Chretien)；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 (Yasuo Fukuda)；新加坡榮譽國務資政吳作棟 (Goh Chok Tong)
- **來自美國的：**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艾德溫·福爾納 (Edwin Feulner)；前白宮幕僚長、紐約梅隆銀行副主席威廉·戴利 (William Daley)；耶魯大學傑克遜國際事務中心高級研究員斯蒂芬·羅奇 (Stephen Roach)；前國會參議員馬克·柯克 (Mark Kirk)；美國商會中國中心主任及大中華區副主任王傑 (Jeremie Waterman)；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副會長白莉娟 (Jan Berris)；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主任杜克雷 (Clayton Dube)；上海紐約大學首任副校長傑弗里·雷蒙 (Jeffery Lehman)；喬治·布殊美中關係基金會總裁方大為 (David Firestein)；美國中部地區美中協會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鮑勃·霍頓 (Bob Holden)；得克薩斯州商業聯盟首席執行官傑夫·莫斯利 (Jeff Moseley)；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市議員吉米·弗蘭尼根 (Jimmy Flannigan)；喬治·布殊美中關係基金會商業項目和企業事務主任羅賓·古德曼 (Robbin Goodman)；大奧斯汀亞洲商會首席執行官瑪麗娜·巴加瓦 (Marina Bhargava)；

Core Engineering 項目工程師**威爾·尼科**斯 (Will Nichols) ; 拉雷多商會董事**安德魯·卡蘭科** (Andrew Carranco) ; M&A國際創始人**徐莉** (Li Xu) ; 喬治·布殊美中關係基金會創始人及董事會主席**尼爾·布殊** (Neil Bush) ; 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Red Bison諮詢集團執行主席**威廉·歐文斯** (William Owens) ; 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美國-亞洲安全倡議項目主任**艾江山** (Karl Eikenberry) ; 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奧克森伯格-勒倫學者**大衛·蘭普頓** (David Lampton) ;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前院長、國際政治學教授**瓦利·納斯爾** (Vali Nasr) ; 前美國駐華大使**博卡斯** (Max Baucus)

- **來自中國的：**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原商務部副部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中國前駐美大使**周文重**；中國國際投資促進會會長**馬秀紅**；原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理事長**田力普**；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昌林**；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部長**趙昌文**；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會長**曹德榮**；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副會長**傅向升**；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秘書長助理兼貿易協調部主任**許海東**；正泰集團董事長、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南存輝**；中國電子商會會長**王寧**；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戚振宏**；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名譽院長**楊潔勉**；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創始人兼理事長**王輝耀**；華潤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傅育寧**；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創始及執行合伙人**沈南鵬**；英特爾副總裁**楊彬**；戴爾科技集團全球副總裁**周兵**；高通公司全球副總裁**郭濤**
- **來自中國香港的：**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恆隆地產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啟宗**；香港中文大學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劉遵義**；弘毅投資創始人兼總裁**趙令歡**

與會者是現任和前任政府官員、商界領袖及知名學者，他們就自由貿易、關稅和多邊主義在當世界的價值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和分析。未能前來出席會議的一些人還提供了預錄的發言，比如布朗大學沃森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前美國國際安全事務助理國防部長**傅立民** (Chas Freeman) ，以及 C. V. Starr 董事長兼 CEO、美國國際集團前董事長兼 CEO **莫里斯·格林伯格** (Maurice Greenberg) 。

這些與會者利用豐富的集體經驗參加了一系列小組討論，評估如何解決貿易戰引發的經濟關係緊張。在以「經貿關係現狀」、「全球化、多邊主義和全球治理前景」、「投資環境與技術創新」、「德克薩斯州和美國中部地區代表談『合作』」為主題的小組討論中，大家探討了兩國如何從貿易關係中獲益、美國和中國最具互補性的經濟領域、美中兩國的微觀層面如何在艱難時期保持關係，以及其他影響現行關稅政策的政治議題。

發言者強調，不能忽視中國和美國當前的國內政治氣候。他們同時指出，白宮領導人的變動不會自動使中美關係回到 2016 年的狀態。許多小組討論者認為，承認永久的變化，是實行新的富有成效政策的先決條件。他們還一致認為，中美兩國競爭的大環境已經發生改變，經濟、技術、地理

和安全考量對兩國看待彼此的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隨着力量的平衡轉向競爭對立，一些人擔心，那些把談判對手視為敵人而非朋友的人，將日漸成為政策的推動者。

作為解決中美緊張態勢的關鍵方法，發言者強調在經濟領域之外尋找跨國議題的重要性，因為在這方面兩國可以合作。這類議題可以在外交領域，也可以在私營領域，比如核擴散和氣候變化。發言者還強調了貿易戰中「成功」的不同定義，指出解決這一問題是達成協議的關鍵。

論壇其他重要成果包括：

- 中國和美國已經發現自己處在新的國際環境中，它是無法靠領導層的更迭來緩和的。兩國在制定政策時必須承認並考慮這一新環境。
- 地緣政治現實、技術創新和安全考量大大改變了各國看待彼此的方式，使它們從合作夥伴變為競爭對手。
- 通過確定影響中美兩國的跨國議題，雙方能夠找到合作的領域。

以「中美經貿關係：現狀與前景」論壇為例的這類對話，對於彌合中美之間日益擴大的分歧是必要的，尤其在這個充滿爭執的時期。保持這類對話可以確保未來中美關係的加強，而不是惡化。正如董建華先生強調的，「中美脫鉤有百害而無一利」。G20 結束後，工商界、學術界和政府的領袖們迅速聚集在一起，探討中美兩國的未來，正是展現了這種信念的活力與力量。

論壇結束後，我們在同與會者和發言者的交流中得到令人鼓舞的積極反饋：

- 時常舉辦這類論壇不僅增添動力，而且增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 在就經濟和貿易問題交換意見時，必須坦誠面對中美兩國國內政治的影響。
- 令人鼓舞的是，大多數與會者對中美關係的未來持樂觀態度，相信合作將是保持兩國關係的關鍵。
- 正如論壇中許多討論所強調的，重要的是要記住，中國和美國應當把雙方的討論與合作擴大到貿易領域之外。
- 論壇成功的一部分原因，是它為日本、加拿大和新加坡等「第三方聲音」提供了平台。或許應當有一個論壇來關注「附帶傷害」，即當美國和中國要求其他國家站隊時，會給無辜的旁觀者帶來什麼影響。

這些反饋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將繼續推動持續的對話和積極的互動。中美交流基金會、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以及董建華先生對所有參加和支持本次論壇的人士深表感謝，並期待着我們今後的合作。

會議背景

這是一次高級別國際會議。會議匯集來自不同國家的政治家、前政府首腦、高級外交官、商界領袖和知名學者，共同探討中美關係的現狀與前景。

目的

本次論壇恰逢美中建交 40 周年。在剛剛結束的 G20 峰會上，中美兩國領導人於 2019 年 6 月 29 日達成繼續談判的共識。

本次高級別的非政府間交流之目的是尋找應對當前挑戰、推動未來合作與穩定的方法，以促進中美關係。

論壇彙集國際社會的智慧與力量，讓大家就多邊主義、自由貿易和全球經濟持續增長的核心問題表達看法。

主題

本次論壇是一次自由開放的對話，討論重點包括經貿關係、知識產權、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開放市場和全球治理，以及美中關係的前景與發展。



開幕式

歡迎辭

董建華 (Tung Chee-hwa)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美交流基金會創辦人、主席

今天很高興歡迎各位來到香港這個漂亮的愉景灣，討論有重大全球意義的話題。希望優美的環境能給各位帶來更多靈感。

6月29日，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在G20大阪峰會期間舉行會晤。是時候聚一聚了。人們也許認為，峰會剛過，還太早。但這正是關鍵，我們正是要討論這次峰會的影響和對我們大家的重要性。

很高興今明兩天我們有機會深入探討許多重要問題。希望我們的討論不僅對各位有幫助，而且能激勵大家採取更多行動，來支持極為重要的中美關係。

最後，希望這次會議結束的時候，我們能對未來更積極，更有信心。我對各位前來參加這次會議深表感謝，你們中的一些人是不遠萬里而來。謝謝大家，謝謝你們中的每一位。



主題演講



福田康夫 (Yasuo Fukuda)

日本前首相

福田康夫在講話中表示，中國當前面臨的問題與日本曾經面臨的問題類似。最近美國談判代表對中國的措辭，讓他想起他們當年對日本的態度。

他講述了日本政治領導人和決策者如何因誤判和管理不善，導致了前所未有的泡沫經濟。泡沫經濟破裂使日本出現十多年的嚴重衰退。

根據福田康夫的說法，日本與美國進行過艱苦談判，在這一過程中得到很多重要的教訓。他說，日本經歷的所有困難，都證明是日本產業與社會走向現代化與國際化的「陣痛」。

他承認，美國的要求不一定公正。但除非採取適當的政策措施，否則全球都將繼續受到嚴重的負面影響。

福田康夫就當前形勢向中國提出幾點建議：

- 中國走的每一步不僅影響中美關係未來，也影響整個世界的發展方向。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應發揮何種作用，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問題。
- 中國作為當今世界兩大強國之一，必須與其他主要國家共享全球化願景，展示世界強國應有的責任感。
- 中國不應將自己看成與美國貿易摩擦的受害者。相反，中國應把這一困難階段視為讓國家變得更好的重大機遇。這種鍥而不捨的努力將為未來鋪平道路，使中國找到經濟持續增長的新引擎。
- 中國作為大國，應當正視與其他國家合作所面臨的挑戰。中國應該邁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第一步。這條道路不僅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全世界。



艾德溫·福爾納 (Edwin Feulner)

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艾德溫·福爾納認為，無論 2020 年總統和國會選舉結果如何，「等特朗普下台，這樣事情就能恢復『正常』」都不是可行的策略。無論誰贏得下屆總統選舉，在經濟政策方面，中美關係都不會回到特朗普之前的狀況。他建議中國不要期望美國政策回到「過去正常的美好時光」。

他指出，挑戰是切實存在的，但中美經濟關係重建和升級的機會也是存在的。通過明確而坦誠地說清楚這些挑戰，兩國可以確定問題所在，更充分地了解彼此的分歧，甚至可以解決其中的一些分歧。

在他看來，兩位領導人在大阪的微笑握手不能保證最終達成協議，因為從美國角度說，有三個基本問題尚未解決：

- 第一個障礙是知識產權。在這個問題上雙方觀點有根本的不同，各成一體且相互對立。無論竊取知識產權案件、強制技術轉讓或網絡安全擔憂有哪些具體細節，尊重專利與知識產權這個首要問題必須坦誠公開地予以討論。解決這個問題不能只靠微笑、動聽的聲明，或改革「在即」的承諾。
-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在 WTO 的「發展中國家」地位，以及中國作為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接受世界銀行巨額貸款。如果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那麼美國就有理由設想中國會像第二大經濟體那樣行事，而不是試圖玩弄世界體系。
- 第三個主要挑戰是中國在改變談判的基本規則。

福爾納在總結時表示，至少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里，無論誰前誰後，美國和中國仍將是兩大主要經濟體。中國作為崛起的大國，將不得不學習如何面對美國仍是當今主導力量這一現實。兩國必須繼續進行對話，在會晤時採取積極行動，並切實執行那些維繫兩國關係的協議。



曾培炎 (Zeng Peiyan)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長、國務院原副總理

曾培炎理事長的發言圍繞美國聲稱的對華貿易「吃虧論」。他從三個方面系統性分析了為何「吃虧論」站不住腳：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形成的客觀必然性、全面客觀看待美對華貿易逆差數字、美國在對華經貿中是實實在在的受益者。

他認為，對於貿易逆差問題，美國不能只片面強調貨物貿易逆差，要全面看待貿易逆差產生的

原因以及得失，採取政策措施要建立在客觀分析基礎上，一味加征關稅只會適得其反。希望中美雙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達成彼此都能接受的貿易協議。這不僅對兩國經貿關係具有歷史意義，對國際經貿合作也有示範意義。

曾培炎演講的要點包括：

- 美國貿易逆差由來已久，這與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美國低儲蓄、高消費形成的內部失衡，以及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即追求高附加值的服務業、向海外轉移製造業等密切相關。同時，美國多年來限制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是對華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政策原因。
- 全面客觀看待美對華貿易逆差數字：
 - 不能僅看貨物貿易，還要看服務貿易。在雙邊貿易中，儘管美國對華貨物貿易為逆差，但服務貿易是順差；
 - 美對華貿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對整個東亞地區的貿易逆差。中國對美貨物出口中，半數以上是加工貿易，中間品主要來自東亞地區。經濟全球化分工條件下，貿易增加值才能反映一國真實的貿易水平；
 - 計算中美貿易額應該用 GNP（國民生產總值）方法，將兩國企業在對方國家的經營收入也計算進來，而非採用已經落後的基於 GDP（國內生產總值）的貿易統計方法。
- 美國在對華經貿往來中沒有吃虧，而是在國家、企業、家庭等各部門獲得了實實在在利益：
 - 美國藉助美元優勢地位獲得大量國際鑄幣稅；
 - 中美貿易為美國消費者提供大量物美價廉商品；
 - 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獲得豐厚回報；
 - 中國為美國提供大量低價美元資本，中國多年來的貿易盈餘主要通過美國國債迴流美國。

議題一 中美經貿關係

分組議題一 經貿關係現狀



威廉·戴利 (William Daley)

紐約梅隆銀行副主席

威廉·戴利表示，中美關係需要的是一種把事情做成的勇氣、動力和激情。雙方必須以合作、積極的方式把事情做成。

即使承認世界現在處於臨界點，戴利還是指出，很多人過於關注中美關係如何充滿了挑戰。但他認為，中美兩國這些年已經取得很大進展；兩國有能力並且會通過經濟手段解決問題，情況最終會好轉。他相信，中美兩國過去 25 到 30 年間的共同努力讓世界變得更好了。

在他看來，沒有什麼是完美的。像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這樣的協議並不完美。這個體系運作了 25 年，肯定有需要改變的地方。他補充說，WTO 也是如此，它可以更好、更快、更公正地運作，看上去更加公平。WTO 必須為 21 世紀而實現現代化，重新發揮作用。

展望未來，戴利指出，對所有相信中美關係有好處的人來說，最大的挑戰是讓中國、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普通人開始看到這些好處。他認為，這是當前中美關係困難的核心所在。



張曉強 (Zhang Xiaoqiang)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執行局主任

張曉強在發言中回顧了中美貿易摩擦的要點，並指出雙方進行了多輪談判，屢經波折，每次波折都源於美方的違背共識，不講誠信。今年 3 月至 4 月底，兩國已就大部分問題達成一致，針對遺留問題，中方提出，雙方要互諒互讓，共同尋找解決分歧的辦法。但美方採取了霸凌主義和極限施

壓手段，堅持不合理的高要價，堅持不取消經貿摩擦以來加征的全部關稅，堅持在協議中寫入涉及中國主權事務的強制性要求，導致雙方無法彌合剩餘分歧。

他還用翔實的數據說明中美貿易合作是互利共贏的、貿易摩擦損人害己。自6月17日至6月25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就對華加征關稅舉行了7天聽證會，參加聽證會的314名美國企業代表，有303位反對加征關稅，蘋果公司、微軟公司、英特爾公司等一批企業要求美國政府豁免關稅。

他指出，美國某些政客看到的是世界其他國家在經貿方面都在佔美國的便宜，大搞貿易保護主義，結果，2018年美國貨物貿易逆差達8900億美元，比上年擴大840億美元，製造了歷史最高紀錄。美方挑起貿易爭端將嚴重干擾全球產業鏈，損害市場信心，給全球經濟帶來嚴峻挑戰。

張曉強闡述了關於美方「不合理高要價」的三點中方立場：

- 多進口美國商品是中方基本態度，但最終實現是企業間的市場採購行為，取決於有市場需求、價格合理；
- 中國企業需求巨大的是美國高技術產品。但恰恰在這方面，美方不僅嚴格限制對華出口而且不斷加大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的管制力度；
- 不論中國企業一年從美國多進口多少億美元，必須要有中方市場的增量需求和美方的供應能力。

張曉強通過對中國進口美國大豆、客機、原油與LNG等三大類主要產品的翔實數據分析，指出這三大類到2020年中國市場的增量需求合計約790億美元。中國即使要實現到2020年比2018年（2018年中國自美國進口共1344億美元）多進口2000億美元的美國貨物，都已經是很大的增長幅度，需要兩國企業及政府機構做出很大努力才可能實現。而美方在5月初突然提出中國政府要承諾增加3000億至3300億美元進口，這明顯是不合理的高要價。

自2018年3月美方單方面發起經貿摩擦以來，中國願意採取合作的方式加以解決，推動達成互利雙贏的協議。雙方應該向對各自經濟發展都有積極促進作用的公平協議的方向努力，美方單贏的協議永遠都不會有，雙方能達成的必須是一個雙贏的協議。美方只要一個「好的協議」，但中方同樣也只要「好的協議」。



斯蒂芬·羅奇 (Stephen Roach)

耶魯大學傑克遜全球事務中心高級研究員
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高級講師

斯蒂芬·羅奇認為，有關中國的辯論被大量的錯誤敘事污染了，無論宏觀層面還是結構層面，都是受政治諉過遊戲的驅使，最終目的是把美國人不願解決或是無法解決的問題推到別人頭上。

羅奇指出，宏觀經濟學的一個基本要點，就是投資必須永遠等於儲蓄。你不儲蓄，又想有經濟增長，那就只好從國外引入剩餘儲蓄，同時保持巨大的國際收支逆差，來吸引外國資本。

由於經常賬戶赤字，美國與許多國家存在貿易逆差，2018年共有102個，甚至包括梵蒂岡。這是一個多邊貿易問題。如果美國不解決儲蓄問題，而是關閉與中國的貿易，中國人會簡單地把貿易轉移到其他對美國保持順差的國家，這意味着通過成本更高的生產者向美國公眾收稅。

羅奇說，除了美國總統和國會錯誤的宏觀敘事，美國對中國新的進攻性政策也存在錯誤的結構性敘事，這體現在182頁的《對根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進行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和創新的中國行為、政策和做法進行301調查的結果》報告當中。

作為學者，羅奇對這篇報告中的證據進行了詳細研究，並得出結論：報告列出的一系列估計作為證據不夠充分，不會被美國法院接受。儘管如此，這份報告已經成為總統對華關稅政策的依據。

羅奇警告說，這樣的政策完全忽視了關稅在20世紀30年代所起的破壞性作用，當時的關稅戰將一場相當嚴重的衰退轉變為美國的大蕭條。

在批評美國的同時，羅奇也給中國提出建議：不要分心。如果中國冒險在關稅和貿易限制上與美國針鋒相對，就有可能忘記那些緊迫的國內議程。生產力和供給側效率、國有企業改革、增長模式的債務強度、創新挑戰等等國內問題，對中國的長期可持續經濟增長和發展來說，都比美國的貿易威脅要嚴重得多。

羅奇還提到，美國非常擔心自己作為世界領先創新者的角色正面臨中國的挑戰。中國則擔心美國企圖遏制它的發展和增長，改變它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美國的主流觀點是，美國擅長打冷戰，美國第一次能戰勝蘇聯，第二次也會戰勝中國。此言差矣。在GDP增速、儲蓄、生產力這三個衡量經濟實力的指標上，美國今天的效率都遠遠不如1947至1991年間的冷戰時期。

因此，羅奇表示，我們需要新的思路。他用以下幾點建議作為結束語：

- 中美雙方都需要改善彼此的市場准入，最好的方式是通過雙邊投資協定（BIT）。兩國就此溝通了十年，如今卻已經中止。
- 中美兩國都應致力於重大的宏觀經濟調整。美國需要增加儲蓄，中國需要減少儲蓄。
- 網絡安全不是一個雙邊問題，而是多邊問題。美國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應該展示共同的領導力，形成一個有爭端解決和執行機制的全球多邊網絡協議。
- 為確保對話，兩國可以建立一個更永久性的機構，設置一位常務秘書，來匯攏雙方的專家，全職處理對雙方都有重大意義的重要問題。這將有助於為雙方的交流提供一個更強大的框架。



莫里斯·格林伯格 (Maurice Greenberg)

C. V. 史帶投資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以下總結自莫里斯·格林伯格發往會議現場的講稿。)

莫里斯·格林伯格表示，中美貿易爭端有可能破壞世界上最重要雙邊關係的穩定。不過在他看來，解決當前困境的辦法是清楚的：

- 作為新興市場，中國築起貿易壁壘來扶植其新興產業，美國等國家出於戰略原因可以接受這一點；由於中國的巨大潛力，外國公司也一直在忍受。但如今，中國完全有能力在國內外市場與外國展開競爭。這就需要改變。為在華外資企業和本國企業提供平等待遇，從而吸引更多來自世界各國的企業，造福中國經濟和人民，這符合中國的最大利益。
- 緊迫感、相互尊重和真正的誠信對確保中美為未來達成協議至關重要。
- WTO 機制目前未被充分利用。這一機制有助於制定並實施此類協議。我們需要新的規則與其他改革，升級並改進 WTO 的運作方式。

格林伯格總結說，雙方都應該明白，這不僅僅是貿易問題，其中涉及的地緣政治風險對美國、中國和世界來說都非常大。他呼籲兩國領導人認識到，此時此刻保持建設性的開放關係比以往更加重要，在這種關係下，他們可以為了和平與繁榮加強雙邊互利合作，這並非零和遊戲。



小組討論

貿易和經濟關係對中美兩國至關重要。當下的關鍵是，我們是否有新的思路破解這一難題，實現創新？



曹德榮 (Cao Derong)

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會長

合則兩利，斗則兩傷。中美雙邊貿易是互利互惠的，而目前的爭端正在傷害雙方。

我對中美農業貿易的看法是這樣的。根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 2019 年 5 月 1 日發佈的《2019 年國家出口報告》，從 2009 年到 2018 年，美國對華出口支撐了超

過 110 萬個美國就業崗位；與此同時，從中國的進口提高了美國民眾的實際購買力與福祉。

2019 年前 5 個月，中國農產品對美出口同比下降了 22%，美國對中國的農產品出口大幅減少了 57.4%。

我們呼籲美國在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基礎上加強與中國的合作，發展互利共贏的經貿合作關係。



馬可·科克 (Mark Kirk)

美國伊利諾伊州前參議員

作為伊利諾伊州的代表，我的目標是增加我們州的收入和經濟機會。顯而易見，像雅培、美聯航這樣的伊利諾伊州大僱主，它們的未來將由中國書寫。解決中美貿易問題的出路是看各個部分的總和，這遠遠超過了整體。如果觀察習近平和特朗普之爭，會發現事情可以總結為一場關乎自尊的零和遊戲。如果看 4000 億美元貿易，你可以看子項，那才是最鼓舞人心的。把所有的子項視為雙贏，這就是我想傳達給中國政府代表們的信息。這些子項充滿了機會。



劉遵義 (Lawrence Lau)

經濟學家，香港中文大學高等金融研究院理事會主席

我對贏得貿易戰的定義，是等一切塵埃落定後，中美雙邊貿易額將比貿易戰之前更高。

貿易戰對兩國經濟的影響實際上是非常可控、可管理的。如果中國出口全部停止，對中國 GDP 的損害大約是 2.4%。如果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全部停止，對美國 GDP 的影響其實也只有大約半個百分點。

我認為關鍵在於找到重回正軌讓雙方都贏的方法。我認為這意味着擴大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同時擴大中國對美國的出口。

確實存在很多應當解決的問題和抱怨，比如知識產權保護，不僅是因為美國政府的堅持，也因為中國同樣擁有很多優秀的探索者和發明家。中國已經走出模仿階段，自己成為真正的創造者。強制技術轉讓真的已經成為了過去式。另一個問題是

網絡盜竊，兩國政府應當聯合打擊網絡商業盜竊。最後一個問題是間諜活動，間諜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職業，並且會存在下去。

如果中國和美國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展開競爭，世界將受益匪淺。



趙令歡 (John Zhao)

弘毅投資總裁

我同意艾德·福爾納的觀點，這次大阪握手不應讓任何人抱有幻想「認為我們即將回到我們框架開始的地方」。

舊的世界秩序已經終結，新的秩序還未建立。我們不知道該如何去建立，因為這意味着要同陳舊的思維、陳舊的敘事作鬥爭，即誰是老大，誰是老二。但我們知道，中國將扮演重要角色。

我有兩個看法。一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地球村，但我們的政治和政策制定者們依然是非常國家化的。另一個是，我們需要更多地去思考世界已經互相依存這樣一個事實。因此，數字化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

我的建議是全球化 2.0 和一個更包容的數字化世界。國家領導人應當放棄那種成為世界第一的想法。新秩序將是包容、多邊、價值驅動、以人為本的。

總結



馮國經 (Victor Fung)

馮氏集團主席

我們需要考慮新世界秩序、全球化 2.0，考慮對人民有意義、解決世界不平等這個終極問題的包容性增長。事實上，當今世界已經完全數字化了。從貿易體系到全球供應鏈，再到人們的需求，世界上的一切都已經發生變化。我們需要思考一個符合我們未來目標的新的世界秩序。為此，我們不僅需要在國家政府層面開展工作，也要在所有層面努力，包括企業層面，以及民間交往。

分組議題二 投資環境與技術創新



馬秀紅 (Ma Xiuhong)

中國國際投資促進會會長

馬秀紅會長在演講中首先介紹了近 10 年中美雙向投資概況，以翔實的數據說明目前中美互為重要的投資夥伴。她隨後介紹了中國堅持擴大開放、改善投資營商環境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包括：

- 外資管理體制機制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備案製取代了執行近 40 年的外資准入審批制，並對外商投資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
- 不斷擴大市場准入範圍，大幅縮減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將限制措施從 6 年前的 190 條，分別縮減至 40 條和 37 條，嚴格落實「非禁即入」；
- 制定並頒佈新的《外商投資法》；
- 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力度；
- 強化外資權益保護，建立並完善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機制等各項制度；
- 國家實施 2 萬億減稅降費措施，這也可以有效降低外商投資企業運營成本；
- 新的《外商投資法》首次將投資促進列入國家大法。

世行《2019 年營商環境報告》顯示，近年來中國營商環境得到明顯改善，在世界各國的排名由第 78 位提升至第 46 位。根據中國美國商會 2019 年度《美國企業在中國白皮書》，2018 年近七成受訪的企業實現盈利，超四成將中國視為全球三大投資目的地之一。

就中美雙向投資面臨的挑戰，馬秀紅認為主要包括兩方面：其一是經貿摩擦加劇對兩國企業投資造成不利影響；其二是美方對外國投資，特別是對中國企業在美投資採取更加嚴厲的審查措施，明顯遏制了中美雙向投資快速發展的良好勢頭。

她還分享了促進中美雙向投資合作談幾點看法：

- 兩國元首在大阪達成「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重啟經貿磋商」的共識，應成為下一步雙邊經貿磋商需遵循的原則。
- 中方應做好自己的事情，落實中央制定的擴大開放、改善投資營商環境的重大措施。
- 加強和深化中美省州和城市間的經貿合作，團結一切反對貿易投資保護主義的積極力量，降低目前經貿摩擦的負面影響。
- 在條件成熟時，恢復中美投資協定（BIT）的磋商。中美 BIT 談判自 2008 年起歷經 9 年 34 輪談判，至 2017 年 1 月已就文本的核心問題和主要條款達成一致，近兩年處於停滯狀態。
- 在 G20 大阪宣言中，與會各方確認致力於實現自由、公平、非歧視性、透明、可預期、穩定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希望美方能遵照上述原則，公正、非歧視性對待給予中國在美投資的各類型所有制企業公平、非歧視性待遇。
- 贊同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教授提出的「中美應建立固定雙邊機制」的建議，討論中美雙方長遠性、戰略性議題。



王傑 (Jeremie Waterman)

美國商會中國中心主任

王傑在演講中首先概述了美國商會成員的一系列抱怨。據他說，美國商會自 2010 年起一直強調，中國的強制技術轉讓、盜用知識產權、通過補貼和國家干預實現產業本地化以及市場保護等做法，使美國企業、工人和競爭力面臨的風險加大。

王傑表示，美國商會及成員對兩國關係現狀和走勢深表關注。他完全同意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長曾培炎所說的，貿易逆差並不是中美關係的核心挑戰；儘管美國商會與美國政府「301 條款」報告的多數判斷結果是一致的，但是，任何一方都承受不起雙向關稅或其他使這場衝突擴大的危險行動。

王傑指出，美國商會及成員對關稅不斷升級感到震驚，並反對這種做法。這些關稅有可能破壞稅收管理改革的成效，傷害了美國的實力和全球經濟，破壞了全球貿易體系。

在當前環境下，美國商界擔心美中兩國利益重疊的圈子正在縮小。王傑強調：

- 人們擔心中國模式的擴張。對大多數美國公司和工人來說，問題不在於必須要面對中國的競爭，而在於競爭的條件（不透明）。
- 從美國企業的角度看，國家安全問題應放在貿易談判之外解決，除非談判重點是解決「301 條款」報告所述的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和市場准入等核心問題。雙方衝突的升級和擴大，正在進一步損害兩國企業之間的信任，加大它們面臨的風險。

- 民粹主義不會消失。美國人對中國態度的轉變早在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前就出現了，在他離開後肯定還會繼續。兩黨在國會的關注點不是由反貿易、強硬反華的保守派引導，而是由參眾兩院親貿易、支持商界的議員引導。這在過去 20 年的美中關係中是未曾有過的。
- 美國商界擔心，為在全球化經濟中打造本國冠軍企業，中國政府過度介入像中國這樣規模的市場，這會不斷加劇零和的對抗性反應。

王傑認為，對美國商會和美國企業來說，接受孤立主義，甚至推動脫鉤，都不是辦法。目前迫切需要在商業領域採取建立信任的措施，避免兩國災難性決裂，因為其後果是嚴重和持久的，沒有哪個國家的經濟可以倖免。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不符合兩國利益，將侵蝕兩國和各國的增長與就業，使所有國家的蛋糕變小，變得更不安全，更不繁榮。他提供的解決方案包括：

- 談判提供了解決嚴重關切的最佳機會，而這些關切正在快速侵蝕中美關係的基石。
- 如果能達成一項全面、高標準、可核查和可執行的協議，就可以為經濟和商業關係的某些方面重建信心與信任奠定基礎。
- 永遠不要讓政治阻礙專業談判者取得進展。同樣重要的是，兩國政府要找到前進的路徑，任何一方都不應通過採取大規模行動來告訴對方出了問題。



王昌林 (Wang Changlin)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在全球經濟增長前景並不樂觀的情況下，王昌林在演講中強調中美應加強科技交流與合作，加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到來，推動世界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

他認為，中美兩國應加強科技與創新合作，有三點理由：

- 中美兩國在推進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發揮着關鍵作用。中美兩國研發投入合計佔世界比重超過 40%，研究人員總量佔比超過 40%；
- 中美兩國在科技與創新方面互補性很強。美國擁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和科研機構；而中國的市場規模和潛力巨大、人力人才資源非常的豐富、產業配套齊全。中美科技與創新合作已經形成了相互依存的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
- 加強中美兩國科技創新合作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中美合作有利於解決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人口與健康、資源與環境等重大挑戰。麥肯錫的報告也指出中國與世界經濟聯繫將帶來巨大的經濟價值。

就如何推動兩國科技創新合作，王昌林還提出了三項建議：

- 着力推動基礎研究和重大技術的突破。面對越來越複雜的重大科學技術問題，任何一個國家要單獨完成都是非常難的，一定要通力合作；
- 加強科技人員的交流與合作，而不是限制留學生科技人員的交流，支持學術機構開展共同的研究，這是推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關鍵；
- 加快構建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管理體系和政策框架。

”

小組討論

中美貿易必須解開這個扣，即美國在中美貿易中吃虧了嗎？中國是某些美方人士所說高新技術的「小偷」嗎？未來美國要不要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還是繼續以冷戰思維、國家安全來排斥中國的投資和貿易？這都是該小組討論的主要議題。



沈南鵬 (Neil Shen)

中國紅杉資本創始人及合夥人

過去十幾年科技迅猛發展，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科技發展形成了正循環。也就是說，科技能夠很快地應用在產業上，並且應用的廣度和深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反過來讓更多的資金在高端研究上進行推動。

這個廣度和深度當中有中國的貢獻，中國不僅提供了廣泛的市場，還提供了非常重要和巨大的場景應用空間。如果說全球市場少了中國，同樣 100 塊錢的科研成果，可能就只能帶來 60 塊錢或者是 70 塊錢的產出，加上中國可能就是 100 塊錢。

中美都有大量科技研發的 IP，有很多的商業開發需求，合作空間非常大。科研突破轉化具有高風險，需要「聰明錢」來推動其產業應用。這個聰明錢，中國是一部分，

美國是一部分。過去十幾年裡，美國的創業企業都非常歡迎中國資本，相信美國的科學家都非常願意看到中國企業的參與。



田力普 (Tian Lipu)

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理事長

儘管知識產權問題是中美商貿談判中一個難點問題，但我還是樂觀認為我們最終還是能夠達成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為什麼？

40年前，中美1979年1月1日建交，當年就簽訂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協議——《中美科技合作協定》和《中美貿易合作協議》，其中就已經都有知識產權條款。

1787年美國就把知識產權保護列入憲法，而中國現代知識產權制度第一步是1983年的《商標法》，跟美國的差距是196年。中國並沒有因為兩個世紀的差距裹足不前，而是在奮力追趕：30年前，美國來華申請註冊專利的數量是1萬件左右，中國人到美國是個位數；2000年前後，美國來華申請專利超過2萬件，中國到美國有100多件；2018年，中國企業到美國申請發明專利超過3.1萬件，美國來華申請專利3.8萬件。

40年間，總計將近100萬家美國企業來到中國投資建廠生產。如果說中國的投資環境、知識產權保護一團糟，他們會來嗎？中國投資、知識產權還在不斷完善發展，問題有，坐下來討論、協商，大家是可以達成協議的。



郭濤 (Jerry Guo)

高通公司全球副總裁

我想中國下一個紅利應該是開放制度的紅利。

一個國家想進入技術鏈和價值鏈上游必備的五大要素：1) 政府巨大的投入，2) 獲取先進技術的渠道，3) 龐大市場，4) 有效競爭和創新制度，5) 足夠的人才供給。中國相對弱的是獲取先進技術的渠道和推進有效競爭和創新制度。

中國的知識產權過去 10 年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現在有一個認知和現實上的差距：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很多人期望中國要按照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行為方式來做事，而不是再按照一個發展中國家。

我有兩點建議：第一，中國政府要重視政策制定和實施的一致性；第二，中國的產業政策的運作需要更加市場化。



周兵 (Zhou Bing)

戴爾科技集團全球副總裁

我有兩個觀點：第一，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目前的位置是由中國的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決定的。第二，技術的發展會改變一個國家的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必須要以前瞻性的觀點去看待我們的經貿關係。

中美貿易的增長是和日美貿易、韓美貿易、台灣與美國的貿易、東盟與美國的貿易的下降同時發生的，這是因為中國獨特的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帶來的，包括在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在港口、物流、海關、外匯等領域的效率具有明顯優勢。供應鏈是中國一個非常強的優勢，不僅在於工業門類的完整，還在於持續不斷的供給；能夠持續不斷提供低成本、高質量的勞動力，這樣的經濟體在全球不多。

如今，技術的發展非常快，數據是將來驅動整個經濟發展的核心能源，數字經濟的發展已經遠超我們的想像。貿易談判不要局限於現有的貿易合作，要看到更遠的、未來的發展空間。



趙昌文 (Zhao Changwen)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部長

科技創新，過去主要是單一技術的創新，今天更多是技術產業綜合體的創新。也就是說，在這個創新鏈或產業鏈的不同環節上，每一個參與國家都為最終創新做出了貢獻。中美貿易摩擦正在對這一全球的創新範式帶來很大破壞性。

美國在創新領域的極限施壓，結果只有一個，就是中國加速完成從技術的依賴到技術的自立。中國目前市場開放、技術依賴的狀態，有體制和政策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應用場景的原因。全球化的分工有其合理性，因為當全球已經有了最先進的技術和設備，某種程度上，自己做並不是最優的選擇；但沒有選擇的時候，就會加速中國從技術依賴到技術自立的轉型過程。

希望，像任正非先生所說，中美應該在高山頂上擁抱，共同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和文明做出貢獻。

總結



魏建國 (Wei Jianguo)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美國是全球貿易規則的制定者，它根本不可能制定一個對自己不利的規則，因此美國在全球貿易中吃虧是不可能的事，是違反人之常情。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不僅是美國最大的國家利益，對中國也是一樣的。

分組議題三 宏觀政策



白莉娟 (Jan Berris)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副會長

白莉娟在演講中提出，人們對當前中美關係的擔憂可以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是互惠。如今許多美國人感到擔心，因為他們深深地感覺美中兩國關係缺乏互惠與公平，其中的不對等包括：

- 外交待遇：中國大使和其同事可以在美國隨意旅行，可以去任何希望去的美國機構；而美國在中國的外交官缺乏這樣的自由，許多人甚至不能訪問中小學和大學。
- 學術機構：美國有近 100 所孔子學院，而中國只允許美國政府在特定的大學中開設幾個「美國角」。現在這些「美國角」也幾乎都關門了。
- 媒體：中國封鎖各種新聞媒體，包括《紐約時報》和幾家社交媒體，並且不能善待記者。這種事情沒有發生在中國駐美記者身上，也沒有發生在為他們工作或接受他們採訪的人身上。
- 簽證：美國人——通常學者，因為寫過或談論過中國政府認為的敏感話題，而被拒絕進入中國。

第二類是美國人不確定應該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

第三類是關於兩國社會不同的文化價值觀。

- 美國是一個開放的多元化社會，中國則更加同質化。兩國都指責對方處理內部問題的方式，而不是集中精力解決各自的問題。
- 與法治有關的事情是許多美國人基於價值觀的另一擔憂。白莉娟認為，人們在譴責這些問題的同時，也需要承認中國在若干法治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白莉娟感到痛心的是中國失去了美國商界和其他方面的熱情支持，比如非營利部門和學術界，它們對中國的支持也在減弱。在她看來，不幸的是反華情緒成為當前民主、共和兩黨少有的共識之一。她同意艾德溫·福爾納的警告，即中美兩國關係已無法回到特朗普之前的狀態。未來將是不同的，兩國都必須學會正視彼此的差異，弄清如何最好地利用這種差異，使兩國關係比從前甚至更好。

白莉娟最後表示，她選擇樂觀，因為她相信中美兩國人民，能取得 1972 年「乒乓外交」成功的人民是很會變通的。



朱光耀 (Zhu Guangyao)

中國原財政部副部長

朱光耀的演講圍繞中美關係現狀和前景框架下的宏觀政策問題。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中美合作帶動全球共同應對挑戰。在全球經濟增速不斷被下調的當下，特別需要國際合作，尤其是中美兩國的合作。

他強調，在全球財政和貨幣政策空間不大情況下，國與國之間的政策協調，特別是中美兩國之間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就變得更加重要。

朱光耀還以 IMF 建立防火牆為例，指出要建立和鞏固真正的金融防火牆，中美兩國的合作至關重要。

他的講話要點包括：

- 2008 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正是中美兩國的政策合作推動了 G20 峰會的建立，才有過去 10 年全球在 G20 框架下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合作。
- 過去 10 年，美國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4 輪高達 2 萬多億美元，但是其他國家並沒有指責美國在操縱利率。美國財政部對於匯率操縱國的定義三條：
 - 美國對於某一國家的貿易赤字超過 200 億美元。
 - 該國經常項目收支不平衡達到 3%。
 - 該國對外匯市場上匯率干預所積累的金額超過 GDP 的 2%。這三條要同時存在才作為匯率操縱國。但現在，美國的商務部要把反傾銷政策同匯率掛鉤，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動向，對於宏觀經濟政策是一個嚴重的制約。
- 我們在金融危機過程中，通過 G20 的努力，特別是中美兩國的合作，促進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防火牆的建立。但美國在今年 4 月份 IMF 和世界銀行春季會議期間表示，他們不再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的份額改革。要真正的建立和鞏固的防火牆，建立強有力的以份額為基礎上的國際貨幣基金體系，中美兩國的合作是至關重要的。
- 艾德溫·福爾納博士從媒體得到的消息「中方要求在恢復貿易談判之前取消關稅」，這個是不準確的。實際是，中方發言人表述的是，「中方要求在談判達成成果之後，雙方要取消全部的關稅」。



小組討論

這個小組將從宏觀政策的角度來探討中美關係的現狀與未來。



杜克雷 (Clayton Dube)

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主任

中美關係確實非常糟糕，而且可能會更糟。我們的工作是確保情況不再惡化。我們必須始終認識到這一事實，即中美關係有廣泛的受眾，不僅有決策者、政治家、領導人，也包括廣大民眾。

中美關係是什麼？事實上，我們從一開始就不是盟友，而是合作夥伴。如今，我們的關係到了一個臨界點。

中美關係向來很複雜，未來也許一直如此。我們是兩個大國，存在利益分歧，但我們也有許多共同的關切。在展望未來的時候，我們必須着眼於這些共同的關切。

這場貿易戰與貿易逆差無關。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不是今天的經濟，而是明天的經濟。我們必須從這一點入手，找到促進健康、公平競爭的方法。

唯一的途徑就是進行廣泛的對話。有些關切會影響到相互信任，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明白，我們的社會正在老齡化，我們共享着這個有限的星球。我們必須共同努力，處理好我們自己的關係，以及我們對一個更加穩定、繁榮世界的承諾。



傑弗里·雷蒙 (Jeffery Lehman)

上海紐約大學首任副校長

我們必須關注的是，中國的美國朋友曾經擁有的設想破滅了。

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中國的大多數美國朋友都認為，隨着中國經濟的不斷

擴大，其結構會很快與 WTO 的其他發達成員趨同。其中三個設想尤為重要：第一，相對於私人市場，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會迅速收縮。第二，除了少數敏感行業外，外國企業很快會獲得真正的國民待遇。第三，外商在華投資創業不再以技術轉讓為條件。這些設想都沒有成為現實，而當這些期待落空時，面對脫鉤壓力，中國的美國朋友們選擇了沉默。

我相信這是個錯誤。並不是只有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規範趨同或者脫鉤這兩個選項。產業政策不同的國家仍然可以享受貿易帶來的某些互惠互利。

脫鉤造成的經濟損害不會是災難性的。我更擔心脫鉤可能造成的另一種損害，即價值觀、文化和人文精神的損害，正如趙令歡在闡述「全球化 2.0」時所說的那樣。商品、服務、資本和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壁壘確實削弱了全球的繁榮，但阻礙思想的自由流動卻是災難性的。來自兩國的一批傑出學者正在研究第三種方法，即「和平共存（讓自己活，也讓別人活）」。我希望這會是未來貿易討論的一個核心方式。

同時，我們需要美國的中國朋友和中國的美國朋友站出來，保護我們的民間夥伴關係。我們必須共同努力，在準確理解中美兩國未來十年將如何演變的基礎上，確保這種夥伴關係以公平、相互尊重的方式延續下去。



傅育寧 (Fu Yuning)

華潤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

就中美貿易關係我想談三點。

第一，合作對雙方有利，對抗讓雙方受損。儘管中國在不同領域有許多領先優勢，但中國仍然嚴重依賴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關鍵技術。製造業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與美國等經濟體產業價值鏈合作的結果。脫鉤無疑意味着兩國都將蒙受巨大損失。

第二，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消費市場，擁有超過 14 億消費者，以及世界最龐大的中產階級。在自然資源、市場，當然還有技術發展方面，中國和美國具有高度互補性。

第三點是關於技術發展的日益一體化。雖然我們是一家中國國有企業，但華潤

在許多領域有很強的商業競爭力，我們是以商業的方式競爭，沒有任何政府補貼或優惠政策。中國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係就像是股東。增進中美理解的最好方法，是邀請美國朋友來參觀我們，看看我們作為一家中國國企是怎樣運營的。

中美貿易的平衡肯定是複雜的，對中美雙方來說，切實可行的做法是擱置某些分歧，尋找更多的共同點。當前更重要的任務，是建立一個解決爭端的機制，幫助雙方解決未來經貿互動中出現的挑戰。



劉尚希 (Liu Shangxi)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

中美之間存在分歧很正常，因為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但是把宏觀問題和微觀問題、整體問題和局部個體的問題都混在一起，就會導致這種分歧難以解決。

美國在推進經濟全球化、一體化過程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也導致了全球經濟體系的不平衡。為什麼說是美國導致了這個不平衡呢？因為美國是體量最大的。體量大的引力大，其他的經濟體自然就會跟着美國的經濟體系在跑。美國哪些方面引力最大呢？

第一是美元。美元的引力是最大的，美元是現在國際貨幣，美國輸出美元獲得鑄幣稅，其他國家都使用美元，全球經濟體系失衡由此產生，美國是逆差，其他國家就是順差。

第二是消費。美國的消費引力巨大，大家生產出東西供應美國市場、美國消費者。美元結算、消費巨大的綜合作用產生的不平衡，在美國國內表現為美國的儲蓄和消費的失衡。美國的宏觀經濟失衡，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也帶來了整個全球體系的不平衡。

那麼，宏觀的問題就要用宏觀的辦法解決，只關注微觀是沒有辦法解決的。需要全球的宏觀政策協調來解決宏觀失衡的問題，每個國家都要努力。中美之間以及全球各個國家之間都必須合作，因為已經是一體化了，已經是一個「地球村」了，你不合作想脫鉤，就會產生巨大風險，這對誰都不利。



南存輝 (Nan Cunhui)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美國過去老是打壓中國的國企，現在又開始打壓中國的民企，看誰有先進的技術就打誰，美國的商業價值觀到底是怎麼了？作為民營企業家，我建議：

第一，要從現實、歷史、從結構上分析形成中美貿易問題的原因，從貨物貿易到服務貿易、再到計算的方法，回歸理性，就事論事。

第二，要正視中國政府在貿易平衡上做出的努力。中國的政策環境、投資環境、法律環境越來越好，改革開放的大門越來越大，不僅是在中國的美國企業受益，全世界都受益。

第三，中美兩國政府都應該積極推動自由貿易和維護多邊貿易的機制，來促進貿易公平包容的發展。

總結



陳文玲 (Chen Wenling)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

通過討論，我們小組形成了三點共識：

第一，中美雙方要解決互信的問題，要有信任，有理解，理性處理中美貿易問題。

第二，美國貿易戰的做法對於中美兩國的經貿關係、對於世界經濟都是不利的。

第三，中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實際上都在向著市場化方向快速發展，美國應該正視中國和中國企業發展的現實，正視中國宏觀、微觀政策改革和開放的現實，這樣才可以真正的解決中美經貿問題。

分組議題四 得克薩斯州和美國中部地區代表談「合作」



方大為 (David Firestein)

喬治·布殊美中關係基金會總裁

方大為在演講中提出一系列問題：中國是美國的死敵，還是不可或缺的夥伴？中國崛起與美國的安全與繁榮是不是固有矛盾，兩個國家能否同時取得成功？「中國夢」和美國的全球主導原則能否存在於同一時空，或者，這個世界不足以大到讓兩個國家和平共處並充分發揮其潛力？這些都是當前美國有關中國論戰的核心問題，方大為稱之為「一場有關美中關係的心臟和靈魂的論戰」。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方大為表示，喬治·布殊美中關係基金會是從前總統布殊這裡得到的啟示——老布殊總統斷然拒絕中國是美國敵人的觀點。2007年，老布殊總統為這種關係提出了十分不同的願景：「我熱愛中國人民，」他寫道，「我對世界的夢想之一，就是這兩個強大的巨人不斷致力於全面的夥伴關係和友誼，這將為世界各地的人民帶去和平與繁榮。」

方大為注意到，老布殊總統的美中關係願景和華府精英今天對中國的態度有着巨大落差。這種差距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美國政策的本質、制定和實行政策的方式、基於事實決策的重要程度。

- 政策本質：美國正在快速放棄羅納德·里根和老布殊的有限政府、親市場、親貿易原則。
- 制定和實行政策的方式：特朗普總統從一種政策立場或觀點向另一種政策立場或觀點的搖擺多變，破壞了全球貿易的兩個重要條件：一致性和可預測性。
- 基於事實決策的重要性：特朗普的對華政策是基於「有選擇性的事實」，而這些在某些圈子裡被稱作顯而易見的謊言。

方大為還表示，當前美中關係的緊張不只是因為特朗普總統及其顧問和盟友。事實上，中國也負有相當大的責任，因為美中貿易關係多年來存在嚴重的不對稱，缺少互惠。在他看來，中國應該像幾十年來美國對中國的商品和服務一樣，對美國的商品和服務開放。

同時方大為認為，把中國定位為美國的敵人將是美國歷史上最大、最不幸的戰略錯誤之一。他反對現政府對中國採取的做法，不是因為這樣做對中國不利，而是因為對美國不利。

最後方大為強調，中國既是美國強大的競爭對手，也是美國成功不可或缺的夥伴和主要利益攸關方；準確認知這兩句至關重要的表述，美國人就能夠——並且隨着時間的推移——會正確對待中國，讓美中關係走上正軌。



鮑勃·霍頓 (Bob Holden)

美國中部地區美中協會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鮑勃·霍頓在演講中闡述了美國中部地區的重要性。他認為如果要影響美國，就必須到這個地區來插旗。

為了闡明觀點，他把關注點放在三個重要領域：文化建設、教育關係和商業紐帶。他認為，如果能將這三者結合起來，那麼經濟會更加強大，兩國的合作夥伴關係會更加牢固。

- 過去 20 年，美國中部地區產生了許多重要的政治領導人。
- 該地區擁有一些國內最好的大學。在美國排名前 100 的大學中，有超過 30 所在中部地區。這裡還有大約 200 個學術機構，雖未達到頂級，但與頂級機構保持着密切聯繫。中部地區特有的文化因素很重要，因為它奠定了夥伴關係的基礎。
- 當人們談論製造業、農業和關稅時，他們不僅僅是在談論美國，他們也在談論中部地區。美國 10 個製造業大州有 6 個位於該地區，20 個農業生產大州約有 16 個位於該地區。當人們談論關稅時，他們不是在談論關稅對全國的影響，而是在談論關稅對全國特定地區的影響。

霍頓建議人們必須設法搭建理解與合作的橋樑，這樣才能繼續前行。中美兩國必須處理的最困難問題，是如何將經濟競爭與國家安全問題分開。



傑夫·莫斯利 (Jeff Moseley)

得克薩斯州商業聯盟首席執行官

傑夫·莫斯利在講話中回憶了鄧小平 1979 年對美國的訪問。他說，很榮幸，40 年前卡特總統邀請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訪問美國，並訪問了得克薩斯州。他表示很高興代表得克薩斯州繼續這場始自鄧小平訪美的對話，因為該州與中國建立了關係。據他介紹，得克薩斯州是美國第一大出口州，中國是它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僅次於墨西哥和加拿大。

莫斯利同時指出，美國和中國有很大的機會向前發展，如果中美貿易談判失敗，風險將是巨大的。

在他看來，得克薩斯州的人民正致力於在得克薩斯商業聯合會內部創建「得州—中國貿易投資聯盟 (TACTIC)」。這樣的聯盟將確保中國資本不會自然流向美國東海岸或西海岸，從而使得克薩斯也成為投資增長的地方。

莫斯利還重申，得克薩斯州打算保護現有的中國投資，確保已經來到該州的公司有機會擴大並增加它們的就業崗位和工資。



吉米·弗蘭尼根 (Jimmy Flannigan)

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市議員

吉米·弗蘭尼根認為，人們從市政角度開始思考國際關係非常重要。他認為美國在聯邦和國際層面都缺少這一點。

他指出，美國人沒有單一的文化或觀點，城市領導人知道的一個重要卻不為人知的事情是，大多數美國人對中國沒有看法。

弗蘭尼根認為任何關係都不能簡單地被視為輸或贏，否則只有輸家。城市領導人知道，唯一的繁榮是共同的繁榮，擁有強大的經濟，擁有繁榮，也就擁有了和平。他表示在全球範圍內更是如此。人們越是將經濟成功緊密地聯繫起來，就越能實現更持久的穩定的世界和平。

他指出，國際決策對美國的地方城市有影響，對中國也一樣。因此，城市領導人必須務實，他們必須着眼於共同的繁榮，着眼於一個有明確目標、摒棄黨派政治的未來。

美中關係前途未卜。但弗蘭尼根認為，人們知道美國的未來和美中關係的未來不取決於華盛頓目前在台上的這些人。相反，它將由美國下一代領導人來決定。而這個未來是美中兩國城市領導人可以合作建立的下一代兩國關係未來，是迫切需要美中兩國城市領導人在全球村像鄰居一樣攜手創造的未來。



小組討論

美中關係始於 40 年前，當時改革家鄧小平訪問了得克薩斯州的西蒙頓。本小組討論者來自得克薩斯和美國中部地區，他們談到得克薩斯州和他們所代表的社區，特別是當地與中國的商業往來、貿易、投資與合作。



徐莉 (Li Xu)

M&A 國際創始人

M&A 國際 (International M&A) 是一家全球性的管理諮詢公司，旨在幫助企業在全球開展業務，包括合并、收購以及交易協定的談判和發起。



威爾·尼科爾斯 (Will Nichols)

Core Engineering 項目工程師

中國已經表示有可能從美國進口更多的產品，但價格必須合理，產品必須是它需要的。當然，這就是生意。只要你做任何交易，不管數量我們是否滿意，那都是好事。

我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我們也有許多共同之處。但又何必美國一定要像中國，或者中國一定要像美國呢？

得克薩斯州是美國最大的原油出口地，有大量石油、天然氣，特別是液化天然氣。現貨市場的液化天然氣超過 50% 是運往中國。

如果得克薩斯州有一家中國公司收購美國的資產，再按我們想要的價格把產品出口到中國，那會怎麼樣呢？那簡直太對路了！它讓我們的競爭優勢比我們在自己市場已有的優勢更大。這也符合本屆政府向中國出口更多美國商品的目標。為什麼要與在得克薩斯州的中國公司合作呢？因為美國人花的錢比他們應該花的多，而中國人存的錢比他們應該存的多。因此，創建一個美中合資企業，利用這些資產，並且與兩國政府合作。這才是聰明的關稅計劃。



瑪麗娜·巴加瓦 (Marina Bhargava)

大奧斯汀亞洲商會首席執行官

大奧斯汀亞洲商會管理着大奧斯汀地區的亞裔美國人商圈。奧斯汀是美國增長最快的大城市，它的人口每 20 年翻一番，而亞裔美國人的增長還要快一倍，每 11 年翻一番。

奧斯汀的獨特之處在於，這座城市資助並且支持本地的少數族裔商會。這裡 20% 的居民是在外國出生的。這就是我們存在的原因，我們在幫助搭橋。



安德魯·卡蘭科 (Andrew Carranco)

拉雷多商會董事

拉雷多是美國最大的港口，每天有 1.5 萬輛拖車以及 24 至 32 列火車在忙碌。拉雷多每年的貿易約達 3000 億美元，其中 2920 億是與其最大貿易夥伴墨西哥。雖然中國是拉雷多的第二大貿易夥伴，拉雷多每年與中國的貿易額大概是 40 億美元。我們希望把這個數字再提高一點。

拉雷多正在建造最大的「外貿區」，幫助促進與墨西哥、中國的貿易，並將美國納入其中。

拉雷多美麗而獨特。我們是美國人，但我們說西班牙語。美國還沒有哪個地方是這樣的。



方大為 (David Firestein)

喬治·布殊美中關係基金會總裁

尤其在聯邦政府阻礙我們兩國之間合作之時，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真正發揮各州、城市、企業和非營利組織參與的力量。民間接觸的必要性、價值和影響力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重要。

就能源資源來說，得克薩斯州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單一實體，擁有與沙特阿拉伯一樣多的石油。在美國，得克薩斯州的石油、液化天然氣、風能、太陽能都占第一位，煤炭和水電也名列前茅。所以我們是一個能源寶地。我們可以讓事情有所不同，把美中關係的指針撥向積極的方向。我很喜歡威爾·尼科斯的觀點。我們需要做一些有創造性的事，打造有積極意義的雙重或三重底線。

我們可以讓美國的對華貿易逆差來個得克薩斯規模的猛降，通過出口我們擁有、而中國需要的液化天然氣，把對中國的逆差減少 1000 億或 1500 億美元。這麼做的唯一障礙是政策。我們需要一個穩定和可預測的政策環境，從而讓美國人和中國人能夠共同努力，給達成這一目標所需的基礎設施投入成百上千億美元。

喬治·布殊中國基金會提出「美中能源自由貿易與投資協定」的構想，讓我們把能源從標準的貿易討論中移出來，把它作為特例。我們正在向能夠接近特朗普總統和中國領導人的人推銷這一想法。

我完全同意弗蘭尼根市議員的意見，中美關係的未來在下一代和下下一代。

總結



羅賓·古德曼 (Robbin Goodman)

喬治·布殊美中關係基金會商業項目和企業事務主任

我們奧斯汀本地的品牌已經通過天貓銷售到中國市場。我們不僅要讓公司向中國市場銷售，還要了解中國市場，了解當地人民和網絡。我們代表團來這裡不僅僅是為了開會，實際上我們還想要讓生意實際做成。

議題二

美中關係：現在與未來



尼爾·布殊 (Neil Bush)

喬治·布殊美中關係基金會創始人及董事會主席

尼爾·布殊在主題演講中回憶他 1975 年第一次到中國，當時他的父親老布殊是美國駐北京的「騎單車大使」。這位前總統在塑造美國對華政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他常常表示，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尼爾·布殊認為，自己觀點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源於父親，以及他本人 44 年來的 140 多次訪華經歷。

他表示，個人自由是美國價值體系的核心。他讚歎過去 44 年在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自由運動，這是人類歷史上在最短時間內有更多人獲得了更多的自由。

但隨着中國崛起，反華言論開始甚囂塵上。他反駁中國處處利用美國為的是搶奪主導地位的觀點。相反，他認為 40 年來兩國商業、教育、外交和文化關係的加強給中美兩國帶來巨大的互惠互利。兩國關係雖有坎坷，但也形成了典型的雙贏局面。

中美關係的核心在於，中國究竟是美國天然的朋友，還是美國的敵人？尼爾·布殊表示，他父親相信，中美兩國有建立深厚友誼的歷史淵源。他認為，將兩國團結在一起的因素比分裂因素更多，而兩國關係根基之深足以抵禦當前的風暴。

尼爾·布殊列出當前的失調導致兩國關係被破壞的幾個原因：

- 中國經濟崛起這一事實引發人們的焦慮。但他認為，零和與輸贏心態是錯誤且幼稚的。事實上，與中國的貿易逆差是自然產生的，是因為較富裕的國家向較窮的國家購買了更多產品。
- 對中國妖魔化的加劇源自美國民族主義抬頭，這反映在反移民、反華以及「美國優先」等言論中。
- 一些評論人士認為，只有西方式民主才能為中國人民提供全套自由。但本質是，美國的制度與民主制度對中國不起作用，正如中國的制度不適用於美國。

尼爾·布殊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 當中國的某些項目受到全球廣泛評論時，中國應該讓自己的意圖與項目實施儘可能透明。
- 美國不應干涉中國的內政。
- 美國政府應採取老布殊的領導方式，即着眼於創造和維持多層次的頻繁對話，力求建立信任，換位思考，了解彼此好的一面，考慮文化差異，尊重、鼓勵並抱有希望，誠實、直接且有針對性。
- 大家有必要發聲，來平衡這場美中關係的論戰，逐步實現老布殊加強兩國關係的願景，在應對人類日益增長的挑戰方面實現真正的合作。
- 兩國必須在氣候變化、流行性傳染病應對、反恐、空間探索、醫學突破和技術發展等全球問題上攜手合作，讓世界更安全、更和諧。

總之，尼爾·布殊表示，更緊密的商業關係，美中兩國市場向對方企業開放，將助推高增長與繁榮，提升兩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更緊密的外交和戰略關係，將有助於全人類應對嚴峻的挑戰，讓地球上人們的生活更和平、更可持續。



威廉·歐文斯 (William Owens)

Red Bison 諮詢集團執行主席、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

威廉·歐文斯在演講中提到，他正在撰寫的《中美 2039》一書試圖描繪 20 年後中國和美國是什麼樣子。在書中，歐文斯提出一個核心問題：如果人們知道 2039 年是什麼樣子，他們會在 2019 年做些什麼來阻止它發生？

在他看來，人們普遍認為到 2039 年中國的 GDP 將顯著提升。如果真是這樣，而且如果人工智能、量子科學和機械人技術在未來 20 年有顯著進步，那麼毫無疑問中國可能擁有世界上最強的軍事力量。美國將是老二。

但歐文斯認為不會有一場冷戰。他相信中國是一個偉大而可敬的國家，會成為一個更強大、更成功的國家。

歐文斯給出三條建議：

- 人文交流項目十分重要，但必須有領導力推動才能實現。

- 2039 年的世界與現在截然不同。具體來說，世界會變得透明，這意味着戰略威懾的效果將大打折扣。人們需要弄清楚，該拿中國和美國這兩個能夠透明看世界的國家怎麼辦。中美兩國應該一起有組織地討論這些重要技術。
- 世界正在變得更糟。海洋和空氣受到污染，氣候持續變暖。中國和美國可以發起一項政府間倡議，研究所有可以真正扭轉現狀的技術。

歐文斯最後表示，十年前他在董建華先生的幫助下發起了「三亞倡議」。「三亞倡議」證明，真正的信任是存在的，這種信任可以建立關係，建立友誼。



董建華 (Tung Chee-hwa)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美交流基金會創辦人、主席

董建華在演講中表示，特朗普和習近平最近在大阪的會面，帶來了中美關係再次向前發展的希望。貿易談判總是艱難的，挫折在所難免，但他相信常理最終會佔上風。

董建華先生提到，現代中美關係始於 47 年前，從那以後，兩國領導人都奉行了確保兩國關係積極向前發展的政策。鑒於當前的中美關係，他建議：

- 對所有人來說重要的是，從歷史根源到對未來的規劃，要了解中國首先要解決什麼。過去 40 年間，中國在提高經濟和改善人民福祉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然而，為了滿足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渴望，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國際上，中國將繼續在貿易、商業、投資等領域與其他國家合作；在國內，中國將尋求科學、技術和創新的發展，繼續走改革道路，對外開放經濟。它的最終目標是要成為發達國家。
- 美國一直擔心中國的快速崛起，但中國並不想成為霸權國家，因為中國的基因里沒有這種東西。中國從來沒有尋求擴大疆界、輸出治理方式、傳播極端意識形態，或征服其他文明。中國倡導的是和平，以及與所有國家共享繁榮。
- 中美關係良好不僅有利於兩國，也有利於整個世界。
 - 中美貿易關係將變得越來越互補。
 - 中美關係不僅僅基於貿易、商業和金融。兩國在全球面臨的重大挑戰方面一直保持着合作，比如 2008 年金融危機，比如有關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未來世界將面臨許多其他挑戰，比如全球人口遷移、核武器擴散、網絡安全，以及科學技術的發展。在所有這些領域，中美合作都是至關重要的，這種合作只會帶來更多機會，來吸引其他重要國家支持這些努力，並讓這些努力取得最後的成功。

- 有些美國人說，中美兩國的政治制度截然不同，怎麼可能實現合作？答案是，兩國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不同，是因為它們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歷史，並且處於不同發展階段。兩國政治制度不同是完全有其道理的，最終目標都是為人民服務。中國的制度適用於中國，這不應成為兩國合作的阻礙。

董建華最後表示，脫鉤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當然也不符合全世界的利益。中美合作越緊密，兩國就會越好，世界也會越好。



周文重 (Zhou Wenzhong)

中國－美國人民友好協會副會長、博鰲亞洲論壇諮詢委員會委員

周文重在演講中指出，回顧中美關係 40 年來的發展歷程，最重要的經驗啟示就是，中美合則兩利、斗則俱傷，合作是雙方最好的選擇。

他表示，中美雙方應回答好戰略互信這一事關中美關係發展的根本問題。「對華遏制、脫鉤、對抗、文明衝突論、新冷戰」等都是嚴重的戰略誤判，如果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形成惡性循環，將中美推入「修昔底德陷阱」。

對於兩國間的分歧，周文重表示，不能讓矛盾分歧來定義當前的中美關係，關鍵是要正確對待和處理。雙方應當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採取建設性方式加以管控。

他的演講要點包括：

- 40 年前，共同利益推動了中美建交。40 年後的今天，還是共同利益推動中美關係不斷向前發展。隨着全球化深入發展，相互依存、利益交融是當今時代的最鮮明特徵。各國唯有選擇對話而非對抗、合作而非摩擦、共贏而非零和，才能更好維護自身利益，為世界帶來更多福祉。
- 中華民族以「和」為核心的價值觀決定了，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中國最大的戰略意圖就是讓人民過上好日子，與各國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不是前蘇聯，不會走「國強必霸」的老路，因為這條路行不通，也不受歡迎。
- 中國不會成為美國，更無意取代美國。中美之間肯定有競爭，但應是積極意義的競爭、符合規則的競爭。中國的發展對美國是機遇，美國的繁榮對中國也是機遇。雙方應當加強聯通而不是彼此脫鉤，不能讓偏見和誤判左右未來的中美關係。
- 出現各種分歧在所難免，但凡事都要看主流。中美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合作遠大於摩擦。

- 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貿易戰沒有贏家，雙方的分歧終歸要通過平等對話磋商加以解決。但任何談判都是有原則和底線的，對於事關國家尊嚴和核心利益的重大原則問題，中國不可能讓步。美方應從中美關係大局和自身利益出發，慎重妥善處理，防止這些問題對兩國關係造成嚴重衝擊和損害。
- 人文交流事關中美關係的社會和民意基礎。美國對所謂「中國威脅」反應過度，最終會損害美國自身利益。

作為中美關係 40 年發展的親歷者和見證者，展望未來，周文重表示對中美關係發展仍充滿信心。只要雙方牢牢把握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正確方向，在互惠互利基礎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礎上管控分歧，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中美關係的下一個 40 年一定能行穩致遠，更好惠及兩國和世界人民。



小組討論

貿易是問題，但並非真正的問題所在。真正的問題或許遠比貿易更深刻。如果不是貿易，那究竟是什麼？



艾江山 (Karl Eikenberry)

斯坦福大學美國 - 亞洲安全倡議項目主任

關於代理人與外部環境的問題，代理人真的非常重要。就美國國內政治和對外政策來說，作為代理人的特朗普總統非常重要。就中國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來說，作為代理人的習近平主席也極其重要。這兩人在中美關係中都非常重要。

我想談談對外部環境中關於安全領域的兩點看法。

一是特朗普總統上台前幾年，美中兩國經濟交往就已經出現安全議題化趨勢。上世紀 70 年代，如果你問美國五角大樓或中國中央軍委領導人，哪些技術對國家安全最重要，他們的回答很可能是「這些重要技術約 70% 是由政府專營合同控制的」，它們是不屬於商業領域的。但現在我們看到的似乎完全相反，這些重要技術約 70% 屬於商業領域。這種正在快速擴散並對國家安全產生深遠影響的技術在數量上是驚人的。

另一點是地緣政治。美中兩國在西太平洋的安全競賽肯定是大事。美國一直在講自由航行，中國一直在講海上主權。發生事故和誤判的風險將非常可怕。

我擔心的是長期內出現更多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競爭。美國此前對雙邊關係的擔憂一直是貿易失衡，但現在變成了全球競爭。一個擔心是，隨着中國在全球各地推進野心勃勃的項目，如「一帶一路」倡議，一種替代體系或秩序已經開始建立，這將導致地緣政治後果。

當然，價值觀對增進相互理解也非常重要。不討論政治價值觀，對美中關係的分析肯定是不全面的。



大衛·蘭普頓 (David Lampton)

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奧克森伯格-勒倫學者

我們要想取得成效，就必須先談談過去 50 年我們致力的美中交流所取得的合作：航空安全領域合作、2003 年 SARS 疫情、中國分享其疫苗，等等。所以，讓我們先來談談什麼是合作，以及它給兩國社會帶來的益處。

我贊同艾德溫·福爾納的觀點，不要以為如果美國政府換屆，一切就會回到從前。但我們也不要因此得出「如果美國政府換屆，一切都不會改變」這樣的相反結論。無論美國下屆政府是共和黨，還是有不同特點的民主黨，政策過程都應當讓人民可以了解，並知道事情是可控的。

我也贊同艾江山的觀點，亂七八糟經濟關係背後的關鍵問題是安全。我們需要就此展開戰略討論。

我有兩點建議。

首先，地方政府之間要合作。華盛頓失靈的時候就轉向地方。我們是聯邦政府，所以各州有能力，有領導力，也有動力。

第二，我們要對子孫後代負責。我建議大家都帶自己的孫子孫女到中國或美國走一走，讓他們得出自己的結論，中國或美國到底是什麼樣的。



戚振宏 (Qi Zhenghong)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現在美國國內有一種看法認為「雙輸好過雙贏」，與中國打貿易戰，美國是受損，但只要中國損失更大，美國就贏了。這種想法的背後有三層意思：一是「美國吃虧論」，美國是中美貿易的吃虧者和受害者；二是覺得美國塊頭更大，承受能力更強，美國與中國對抗一定能勝出；三是認為只要能拖住中國發展，即使雙輸也是值得的。

我覺得這種想法背後的問題，還是如何看對方。美國是把中國看成是朋友、夥伴、競爭者，還是把中國看成敵人？如果把中國看作敵人，那麼任何談判都是表面的，不能解決深層次的問題。

這種「雙輸」的想法十分危險。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估計，如果特朗普對中國商品全面加征關稅，美國家庭年損失將飆升到 2200 美元，美國經濟將陷入衰退。美國有學者提出，美國執政者忙着向公眾作出空泛保證，而中國政府則讓人民做好吃苦準備、打持久戰；這種情況下，誰更能承受雙輸結果？中美惡性競爭甚至對抗必將導致兩國及世界經濟失速、全球治理失序。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積極支持美國召開二十國集團峰會的提議，穩定住了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 2009 年訪華時曾說「在同一艘船上的人必須以和平方式才能共同過河」(When you are in the same boat, you should keep the peace on the crossing.)。這句話對今天的中美關係依然適用。

美國《時代周刊》著名撰稿人羅伯特·賴特在《非零和年代——人類命運的邏輯》一書中指出，人類命運的昌盛必然要懂得從「零和」年代走向「非零和」年代。「雙輸」觀點是歷史的逆流。



楊潔勉 (Yang Jiemian)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名譽院長

我同意大部分與會者的發言，即便唐納德·特朗普總統不會再次當選，時代也已經發生變化。我們必須記住這一點，正如艾德溫·福爾納說的，兩國關係已經無法回到從前。美好的舊日時光已經一去不復返，但未來也並非一定是噩夢。

中美兩國和兩國人民需要了解彼此的心態、處事方式以及思維方式。這是非常重要的。中國人必須認真傾聽美方，尤其在這個艱難時刻。希望我們的美國朋友也更多傾聽中國人的心聲。

讓我們互相學習，知己知彼，向前看，這樣末日場景才不會成為我們的未來。我們可以共同努力讓明天更美好。



瓦利·納斯爾 (Vali Nasr)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國際政治學教授

就未來的全球秩序，以及美國外交政策向何處去而言，中國大概是最重要的國家。

目前存在着兩個理念。一個是美國人相信無論中國是不是 WTO 成員，或中國變得多麼富裕，它都不會因為兩國經濟往來而發生改變；中國更有可能改變世界秩序，而不是被世界秩序改變。另一個是「修昔底得陷阱」，擔心如果中國沒有改變的話，我們終會走向對抗。

在這種語境下，美國可以指望的最好結果就是管控並遏制中國。事實上，奧巴馬時期就已經開始這麼做了，像奧巴馬的「重返亞洲」和 TPP 等。在這個意義上，雖然特朗普對貿易有獨特想法，但他本質上其實是延續了奧巴馬留下的「遏制中國」理念。這其實不是特朗普的問題。

在華盛頓及美國現政府內部，由於美國能阻止中國成為一個超級大國的時間不多了，問題已不僅僅是遏制了。這與霸權沒有太大關係。其實，中國的經濟崛起幾乎無法阻擋，而美國必須做點什麼來阻止它，以重申美國的單極地位；問題主要是在這裡，而不是遏制中國。

我有聽到某些總統顧問提到「1948 年時刻」，即美國必須以冷戰及鐵幕心態來組織所有的外交政策。美國應如何往前走？這涉及很多領域。貿易是第一個，但它只是首當其衝。

還有科技，因為科技領域存在這樣一種觀念，即美國經濟要保持領先於其他國家，如果輸掉與中國的科技競爭，那就完了，基本上等於輸掉了一切。

第三個領域是地緣，因為地緣是遏制政策和全球大國競爭最重要的部分。這很有可能是下一個競爭前沿。

因此，我們不僅要考慮貿易，還要考慮科技和地緣。

除此之外，美中兩國人們的情緒實際上也越來越對立，這也很關鍵。如果中國開始在美國被視為敵人，那也會影響人們對美中關係的整體看法。

在乎美中關係的朋友們，尤其是美國和中國的商界，必須有所投入，以確保這一關係的正常。

總結



陳啟宗 (Ronnie Chan)

恆隆地產有限公司董事長

我對中方的雙贏概念感到很困惑。從邏輯上講，它非常理性，非常正確。但我們說的不只是貿易，而是安全，安全有不同的邏輯。是什麼邏輯呢？事實就是，它沒有邏輯。這是完全不同的邏輯，安全問題上不存在雙贏。

我建議我的中國朋友跳出我們的認知，跳出我們認為可能、合理及雙贏的框架來思考問題。

美國人也許最終會意識到，目前對中國所做的一切於己不利。但美國人總是在用完所有選項後，才會做正確的事情。

對美國朋友，我想說，請思考，並說出你們真正的所思所想，這是我們發現真相的唯一途徑。只有當發現真相時，我們才有機會擁有一個長期的更良好的關係。

議題三

全球化、多邊主義和全球治理的前景



吳作棟 (Goh Chok Tong)

新加坡榮譽國務資政

吳作棟從新加坡的小國視角講述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多邊主義。他將當前世界政治的升溫比作氣候變化，認為如果不加以遏制，當前的趨勢有可能改變整個全球政治氣候。

他在發言中表示，世界正處在十字路口，可能有兩個前途，一個是走向災難，另一個走向發展。而當前的兩種全球性趨勢，即去全球化和脫鉤，有可能導致災難而不是發展。

- 全球化使所有人受益，但如今世界也受到它的某些負面影響。負面影響之一是國家間收入的不平等，造成來自經濟落後國家的合法或非法移民。而在國內，收入不平等也引發社會焦慮，如英國脫歐、美國的「美國優先」、法國「黃馬甲」騷亂，以及歐洲議會選舉中意大利和英國的右翼及民粹主義團體勢力。所有這些都顯示出對「全球化搶走就業」的真正恐懼。

為應對反全球化趨勢，吳作棟提出切合實際的建議：重組經濟，並搞清楚究竟哪裡在喪失工作崗位。最簡便的措施是利用稅收進行再分配；而應對全球化負面影響更重要的是，解決導致國內收入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教育、家庭支持和技能培訓是必需的，為的是培養人們適應新經濟，並讓他們自立。

- 民粹主義政客指責說，是其他國家、外國投資、進口和移民造成了諸多國內問題，他們在利用這種對全球化的不滿。吳作棟告誡，這種趨勢，即從多邊主義轉向民族主義和單邊主義，從開放的全球經濟轉向有選擇的保護主義，是我們必須要正視的真正問題。

吳作棟表示，「在爭吵如何分配全球化的金蛋時，我們有可能殺死生金蛋的鵝」。他呼籲各方竭盡所能避免這一災難性趨勢。

吳作棟還提出從三方面建立中美戰略信任的建議：

- 談到威廉·歐文斯「為戰爭做準備」的說法，吳作棟表示：「我們必須為戰爭做準備，但我們不想要戰爭。」
- 談到美國能否改變中國時，吳作棟表示中國應該利用這些壓力，在可能的領域作出改變和改革。但改變中國政府體制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種源於不同文化和制度的文明的政府形式。
- 關於民主，吳作棟表示每個國家都必須有自己的政府形式，都要遵循讓各國有自己最佳政府形式的客觀標準（法治、待人方式、發展增長、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

吳作棟敦促要形成「緩和的聲音」。那些了解中國和美國、了解雙方衝突與挑戰的人必須發聲，並找到恰當的敘事方法，向美國當權者說明中國並不是敵人。他表示：

- 中國在短短 30 — 40 年內實現了自身的轉型和發展，中國有什麼理由成為所有人的威脅，讓這一切毀掉？
- 如果中國就因為不斷增長而被視為「經濟威脅」，那麼新加坡該如何自處？作為曾經的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總結說：「一個繁榮的鄰居比一個窮鄰居好」，新加坡知道如何與一個富裕國家共處。

吳作棟最後表示，「緩和的聲音」是為了防止走向災難。人們必須發聲，不必站在中國或美國一邊，而要站在原則一邊，這個原則就是法治和大國小國享有平等權利的多邊貿易秩序。



博卡斯 (Max Baucus)

前美國駐華大使

博卡斯在演講中談了他和大多數美國人關心的幾個問題。

首先，他認為中國或許已經不再是發展中國家，相應地改變規則有助於增加信任。基辛格博士多次談到「修昔底德陷阱」：中國在增長，其經濟將很快超過美國；中國也是軍事大國。它將採取哪些行動來顯示它想與西方合作呢？

習近平主席在與奧巴馬總統會晤時提到這一點，但他表示陷阱是不存在的。不過說實話，人們並不知道是否存在陷阱。這取決於中國和美國能否更好地相處。這是人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基本問題，而這個問題他們不能那麼輕易回答。

博卡斯接着表示，另一個問題是吳作棟總理提到的戰略信任。兩個非常不同的國家，有着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如何相互信任？如何着手解決戰略上的不信任？歸根到底是要彼此真正尊重。

那麼，如何獲得尊重呢？必須顯示更大的力量。美國怎樣才能更強大？它需要通過發展重要的基本建設來加強自身。這也意味着美國人應該停止內鬥，並開始與盟友合作。他們應該發展自己的2025 規劃。

與此同時，美國人必須尊重中國。這兩個國家不同，體制不同。美國人必須尊重而不是居高臨下地對待中國人；不需要告訴中國該做什麼，而是要告訴他們美國人能夠和不能夠忍受什麼。

規則問題是美國的另一個重大關切。在博卡斯看來，中國幾乎沒有規則。但他同時表示，中國正致力於實現規則。兩國必須採取一些規則，必須為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找到達成這些規則的路徑。雙方還必須開始執行協議，而如果沒有規則，執行就沒有任何意義。

博卡斯表示，與中國人打交道時，他會恪守「三個P原則」，即：耐心、積極、堅持不懈（Patient, Positive, Persistent）。



讓·克雷蒂安 (Jean Chretien)

加拿大前總理

讓·克雷蒂安表示，中美關係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人們仍然強調的是問題，而不是成就。為此，人們需要回顧已經取得的進展。

克雷蒂安說，問題永遠都存在，但人們需要了解真實的情況。比如在美國，失業率已經處在很長一段時期以來的最低水平。赤字雖然是問題，但這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要解決這些問題，克雷蒂安認為，人們不必有大學文憑，只需要一點常識，而且常識最終會佔上風。因此人們有理由樂觀。

克雷蒂安提出幾點看法。第一，需要有一套被所有人尊重的規則。第二，財富激增掩蓋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財富的再分配；這是所有國家面臨的巨大難題。最後，美國加征關稅並聲稱中國將為此買單，事實並非如此，最後買單的將是美國消費者。



傅立民 (Chas Freeman)

布朗大學沃森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以下總結自傅立民發往會議現場的視頻講話。)

傅立民認為，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能拯救正在遭到特朗普政府破壞的體系。然而，美國突然陷入仇外心理和保護主義，這不僅威脅中國，而且危及整個世界，包括美國。

傅立民認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像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一樣，了解美中兩國積極參與國際體系每個組成部分的重要性。這是全球穩定、可預測、繁榮以及兩國繼續進步的先決條件。當前，這種合作已經變得不可能，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也不可能糾正這種情況。

傅立民指出，中國對這種崩解作出不情願、剋制和有限反應是明智的。但雖然剋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傷害，但並不能抵消傷害，或者不能為最終出現逆轉提供基礎。

因此他認為，現在必須思考的戰略問題是，中國和其他國家可以採取什麼樣的權宜之計和長期措施，來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所帶來的好處，並使其最終回歸正常？

傅立民認為，中國及其他國家必須超越今天的美國來尋求答案，並牢記以下幾點：

- 首先要意識到，對中國國際貿易和投資行為不滿的並不僅僅是美國。
- 對中國來說，一個可行的方法是擴大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繞過美國對全球治理的干擾，表明中國繼續致力於改革開放，從而為全球貿易和投資流動的持續自由化奠定基礎。
- 如果哪一天美國決定重新加入某些國際新架構，比如亞投行和「一帶一路」，中國和這些架構的其他支持者要為美國留下大門、燈光和位置。WTO 及其他支撐基於規則秩序的機構，它們增進自身使命的任何努力亦應如此。
- 國際政治和經濟的真實情況是，少數人反對解決問題，並不一定能夠阻止很多人為了大家的利益而採取行動。
- 在作為中美關係基本文件的《上海公報》中，美中雙方明智地擱置了意識形態分歧，使彼此能在共同關心的問題上並行工作。現在是恢復這種做法的時候了。這是當前扭轉比如在台灣和南海等問題上走向戰爭趨勢的關鍵。
- 最後，成功不僅需要各方對美中關係願景有一個清晰的概念，還要求雙方就所追求的互利目標達成一致。

傅立民最後表示，沒有戰略基礎的關係會讓雙方受制於各種事件，這就是美中關係的現狀。世界各國必須積極捍衛全球化和多邊治理體系，因為那是促進互利、非武力競爭、和平與繁榮的最佳途徑。



小組討論

過去 40 年，美國在中國建立了 7 萬家公司，累計創造了 9000 億美元收入。這種商業關係作為最持久的紐帶，也許最終會使中美經貿關係不再惡化。這一小組的行業代表分享了他們的觀點。



傅向升 (Fu Xiangsheng)

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副會長

中美兩國在石油天然氣領域有着很強的互補空間。中國是全球最大能源消費國，也是石油和天然氣進口量全球第一的國家；而美國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也是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增量最快的國家。據美國的統計，2017 年中國是美國第二大原油出口地、第二大液化石油氣出口地和第三大液化天然氣出口地。中美兩國在石油天然氣領域有着很強的互補空間，加大油氣領域的合作是減少貿易逆差的最佳選擇。

中美兩國在化工新材料和高端化學品領域有很多合作機會。中國石化產業仍屬於產業鏈的中低端，以基礎化學品為主，高端產品仍以進口為主；中國又是製造業大國，對石化產品有着巨大的市場需求，尤其是高端工程塑料、高端聚烯烴、高端膜材料、特種纖維材料、專用化學品等的對外依存度更高。美國處於石化產業的高端，可以與中國基礎化學品配套能力強的優勢形成上下游互補的產業鏈，再與中國汽車輕量化及新能源汽車、風力及太陽能發電、軌道交通等巨大市場需求相結合，中美兩國在化工領域的合作機會和前景無限。

中美兩國石化界都期盼儘快達成平等互利的協議。在羅賓·古德曼先生主持的得州和奧斯丁市朋友們的對話中，重點介紹了得州在石油和天然氣方面的優勢，特別是得州的液化天然氣出口。中國液化天然氣 2017 年進口量是 1337 萬噸，從美國進口佔了四分之一。我們在這次會上受到很多啟發，有很多收穫。



王寧 (Wang Ning)

中國電子商會會長

中美貿易摩擦當中 40% 涉及到電子產品，其中反映最強烈的是關於芯片，也就是集成電路這一塊，中國每年進口的集成電路是占國家進口總額中最大的。

中國每年從美國及日本、韓國等一些國家採購約 3200 億美元的芯片，輸出的是終端產品如手機、電視等。

中美在電子信息產業方面是完全互補的，中國需要大量進口美國先進的芯片、軟件，而美國低端的製造業大部分在中國。美國高端的產品獲利比較高，中國終端產品比較低端而獲利比較低，這是生產發展的規律。

中美貿易摩擦，如果在電子信息產業方面談不攏，雙方都會遭受損失。



許海東 (Xu Haidong)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秘書長助理兼貿易協調部主任

中美汽車行業一直合作良好，但未來也將面臨經貿摩擦帶來的問題。從今年 5 月份開始，原來 10% 的關稅已經提到了 25%，這個費用是雙方來承擔的，最終一定會轉嫁給相應的消費者。

美國大量的零部件企業已經在中國設廠和建立體系，在中國的銷售額占其全球銷售額的 15% 至 20%。中美汽車行業是一種密不可分的關係。

中美汽車在技術轉讓方面完全是一種市場需求，而不是政府強制。比如通用，很早就把技術中心設在了中國，針對中國市場去開發適合中國消費者的車型，這種車型，在美國本土根本連設計和生產人工成本都做不到。比如特斯拉來中國投資，中國政府也並沒有要求特斯拉轉讓相應的技術。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汽車生產和消費的市場，已經連續 10 年世界第一。目前中國的千人保有量只有 172 台，一般發達國家約 500 台，美國是 800 多台。所以中國未來的市場非常大。新能源汽車的市場、智能網聯汽車的市場，中國都是全球最大的。

擁有巨大的市場、完備的供應鏈、勤勞的產業工人，中國未來會成為汽車製造的一個基地。



楊彬 (Brent Young)

英特爾副總裁

半導體產業聯盟完全是一個全球性的產業，貿易便利化非常重要。

中國採取了一些非常積極的措施。根據一個有關貿易便利化的營商環境調查，中國 2018 年的全球排名從前一年的 97 位上升到第 65 位，在全球範圍提升了 1/3。這個進步是巨大的。

從法律透明度到規則和程序，中國還有很多可以改進。我們希望看到中國在這方面採取更多的措施。

總結



王輝耀 (Wang Huiyao)

全球化智庫主席

我們小組的討論證明了中美兩國之間的基本面、企業界跨境的基本面是非常好的。我們聽到了各個不同行業的觀點，這應該是兩國人民之間最重要的直接聯繫，這些基本面能最好地促進中美關係。

中美經貿關係：現狀與前景

2019年7月9-10日
愉景灣，香港

會議第一天（7月9日，星期二）

09:00-10:30 開幕式

歡迎辭：

董建華（Tung Chee-hwa），全國政協副主席，中美交流基金會創辦人、主席

主題演講：

福田康夫（Yasuo Fukuda），日本前首相

艾德溫·福爾納（Edwin Feulner），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曾培炎（Zeng Peiyan），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長、國務院原副總理

10:30-10:50 茶歇

10:50-18:10 議題一：中美經貿關係

10:50-12:30 分組議題一：經貿關係現狀

主題演講：

威廉·戴利（William Daley），紐約梅隆銀行副主席

張曉強（Zhang Xiaoqiang），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執行局主任

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耶魯大學傑克遜全球事務中心高級研究員、

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高級講師

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Greenberg），C.V. 史帶投資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小組討論：

曹德榮（Cao Derong），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會長

馬克·柯克 (Mark Kirk)，美國伊利諾伊州前參議員
劉遵義 (Lawrence Lau)，經濟學家，香港中文大學高等金融研究院理事會主席
趙令歡 (John Zhao)，弘毅投資總裁
馮國經 (Victor Fung) (主持人)，馮氏集團主席

12: 30-13: 30 午餐

13: 30-15: 00 分組議題二：投資環境與技術創新

主題演講：

馬秀紅 (Ma Xiuhong)，中國國際投資促進會會長
王傑 (Jeremie Waterman)，美國商會中國中心主任
王昌林 (Wang Changlin)，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小組討論：

沈南鵬 (Neil Shen)，中國紅杉資本創始人及合夥人
田力普 (Tian Lipu)，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理事長
郭濤 (Jerry Guo)，高通公司全球副總裁
周兵 (Zhou Bing)，戴爾科技集團全球副總裁
趙昌文 (Zhao Changwen)，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部長
魏建國 (Wei Jianguo) (主持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15: 00-15: 20 茶歇

15: 20-16: 30 分組議題三：宏觀政策

主題演講：

白莉娟 (Jan Berris)，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副會長
朱光耀 (Zhu Guangyao)，中國原財政部副部長

小組討論：

杜克雷 (Clayton Dube)，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主任
傑弗里·雷蒙 (Jeffery Lehman)，上海紐約大學首任副校長
傅育寧 (Fu Yuning)，華潤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

劉尚希 (Liu Shangxi)，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
南存輝 (Nan Cunhui)，正泰集團董事長，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陳文玲 (Chen Wenling) (主持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

16: 30-18: 10 分組議題四：得克薩斯州和美國中部地區代表談「合作」

主題演講：

方大為 (David Firestein)，喬治·布殊美中關係基金會總裁
鮑勃·霍頓 (Bob Holden)，美國中部地區美中協會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傑夫·莫斯利 (Jeff Moseley)，得克薩斯州商業聯盟首席執行官
吉米·弗蘭尼根 (Jimmy Flannigan)，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市議員

小組討論：

徐莉 (Li Xu)，M&A 國際創始人
威爾·尼科爾斯 (Will Nichols)，Core Engineering 項目工程師
瑪麗娜·巴加瓦 (Marina Bhargava)，大奧斯汀亞洲商會首席執行官
安德魯·卡蘭科 (Andrew Carranco)，拉雷多商會董事
方大為 (David Firestein)，喬治·布殊美中關係基金會總裁
羅賓·古德曼 (Robbin Goodman) (主持人)，喬治·布殊美中關係基金會商業項目
和企業事務主任

18: 10 第一天休會

會議第二天 (7月10日，星期三)

08: 30-10: 20 議題二：美中關係：現在與未來

主題演講：

尼爾·布殊 (Neil Bush)，喬治·布殊美中關係基金會創始人及董事會主席威廉·歐文斯 (William Owens)，Red Bison 諮詢集團執行主席、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
董建華 (Tung Chee-hwa)，全國政協副主席，中美交流基金會創辦人、主席
周文重 (Zhou Wenzhong)，中國-美國人民友好協會副會長、博鰲亞洲論壇諮詢委員會委員

小組討論：

艾江山 (Karl Eikenberry)，斯坦福大學美國-亞洲安全倡議項目主任

大衛·蘭普頓 (David Lampton)，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奧克森伯格-勒倫學者
戚振宏 (Qi Zhenhong)，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楊潔勉 (Yang Jiemian)，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名譽院長
瓦利·納斯爾 (Vali Nasr)，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國際政治學教授
陳啟宗 (Ronnie Chan) (主持人)，恆隆地產有限公司董事長

10: 20-10: 40 茶歇

10: 40-12: 20 議題三：全球化、多邊主義和全球治理的前景

主題演講：

吳作棟 (Goh Chok Tong)，新加坡榮譽國務資政
博卡斯 (Max Baucus)，前美國駐華大使
讓·克雷蒂安 (Jean Chretien)，加拿大前總理
傅立民 (Chas Freeman)，布朗大學沃森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小組討論：

傅向升 (Fu Xiangsheng)，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副會長
王寧 (Wang Ning)，中國電子商會會長
許海東 (Xu Haidong)，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秘書長助理兼貿易協調部主任
楊彬 (Brent Young)，英特爾副總裁
王輝耀 (Wang Huiyao) (主持人)，全球化智庫主席

12: 20 論壇休會

